

束锡红 ( 北方民族大学 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银川 750021 )

# 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史料价值和出版意义

[ 关键词 ] 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 吐蕃

[ 摘 要 ] 藏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 建立于中古时期的吐蕃王朝以其创建的古藏文文字, 记述了当时藏族的历史, 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本文通过对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史料价值的分析, 综述了国际藏学界对吐蕃早期文字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而全面研究、整理、出版现存于英国、法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 必将对我国古藏文研究、敦煌学研究、吐蕃社会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 中图分类号 ] G256

[ 文献标志码 ] B

[ 文章编号 ] 1005- 8214 (2008) 03- 0120- 03

中国藏族历史源远流长, 自 7 世纪松赞干布命人创建文字的 1 000 多年来, 藏族同胞用本民族文字写下了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 为后人研究藏族历史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现存中国各民族文字古籍文献中, 藏文文献仅次于汉文而居第二位。而敦煌藏经洞在 20 世纪初被发现后, 有关吐蕃早期文字和文化的问题更是引起了今人的广泛关注, 以敦煌古藏文文献为资料来源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更是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可惜的是, 大量的敦煌古藏文文献流失海外, 未能睹其真容, 成为我国藏学研究者近百年来之切肤之痛。寻找流失海外的古藏文文献, 同汉文文献以及其他民族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必将能比较深入地反映藏族历史文化发生、发展的轨迹, 藏族地区方方面面的社会状况及其与国内各兄弟民族和周边国家的交往联系; 同时对于开拓藏学研究的新的领域, 重构藏族本民族的历史以及和其他民族的关系史, 赶超国际藏学研究的学术浪潮等诸多重大方面, 具有无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 1 吐蕃早期文化与文献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藏族同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主要成员之一, 西藏历史和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 且地域辽阔, 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也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多元化和不平衡性。

我国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吐蕃历史文献, 产生于 7—9 世纪, 几乎和藏文的创建同时开始, 直到 9 世纪吐蕃势力退出敦煌为止。这批资料无疑是西藏最早的文字记录, 承载了西藏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早期历史即吐蕃历史。以敦煌古藏文文献为对象的研究, 对于全面了解西藏历史, 诠释藏族文化, 认知藏汉文化的双向交流, 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批文献总量将近 10 000 件。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分别在 1907 年、1908 年从敦煌藏经洞劫掠的

文献, 分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

由于大量文献流失海外, 尤其以我国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流失最为可惜, 国内古藏文研究和敦煌文献研究一直难以与国际学术界比肩。敦煌藏经洞流失海外的古藏文文献, 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国; 其研究成果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主要集中在法国、英国、匈牙利和日本等国。80 年代以后, 中国的藏学研究伴随敦煌古藏文资料的公布和受到重视, 有了较大的发展。据报道, 在国外, 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 3 000 多人在研究藏学, 藏学研究机构纷纷建立, 据统计仅美国就有 10 多个藏学研究机构, 藏学刊物分布世界各地, 大批研究成果呈现于世, 其中不乏水平较高的经典之作。

## 2 敦煌古藏文写本与国际藏学研究现状

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和印度事务部藏有的古藏文写本, 还包括霍恩雷收集品和斯坦因 3 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献资料中与印度有关的梵文、于阗文、藏文、吐火罗文等文种的写本。据不完全统计, 有梵文写本数千号, 藏文卷子约 3 500 号。但由于印度事务部所藏主要是梵文、藏文、于阗文、吐火罗文等非汉文材料, 因此, 往往为重视汉文材料的国内学人所忽略。这些材料的缩微胶卷早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就由榎一雄购回日本, 在日本东洋文库、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等单位以影印本的形式供研究者使用, 而今天国内大多数学者仍然没有见过这批宝贵资料。陈寅恪等敦煌专家曾疾呼诚望国内有关机构能早日设法获得印度事务部藏各文种写本的缩微胶卷和照片。

英国收藏的古藏文文献, 主要出自敦煌藏经洞和新疆米兰、麻扎塔格 3 处, 是最具研究价值的藏品之一。早在 1914 年, 斯坦因就邀请比利时佛学家瓦雷·普散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1869—1937) 为敦煌藏文写卷编目。普散生前编好了 765 号藏文佛典的目录, 但迟到 1962 年, 他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sup>[1]</sup> 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者将这批写本分作 10 类:

( 1 ) 律; ( 2 ) 经及注疏 ( 可考梵文名称者 ); ( 3 ) 经 ( 译自汉文或可考藏文名称者 ); ( 4 ) 经及注疏 ( 未比定者 ); ( 5 ) 怛特罗文献 ( 可考梵文名称者 ); ( 6 ) 怛特罗文献 ( 比定而无梵文名称者 ); ( 7 ) 怛特罗文献 ( 未比定者 ); ( 8 ) 论 ( 可考名称者 ); ( 9 ) 论 ( 未比定者 ); ( 10 ) 藏人著述。

托玛斯 ( W. Thomas ) 在 1903 年—1927 年间先后任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员、馆长, 从 1927 年开始连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发表古藏文文书研究的长篇文章。到 1963 年共出版了 4 卷, 包括 600 件古藏文文书。托玛斯和法国巴考、杜散合作, 编纂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和翟理斯合编了《藏汉语句》, 以及其他古文字、

象雄语的研究等。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内收藏的古藏文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文献内容主要是伯希和从敦煌获取的大量藏经洞文献,包括汉文文献4000多件,藏文文献4000多件,还有其他粟特、龟兹、回鹘、西夏文文献等。来自藏经洞的这部分文献为5—10世纪写本;来自敦煌北区石窟的文献,约为11—13世纪写本。出于藏经洞的材料,大多属于吐蕃佛教的前弘期,在朗达玛灭佛毁佛(公元838—842年,其影响持续100年,直到10世纪才进入后弘期)之前,是中古民族文化兴废继绝的重要文献。也是我们研究西藏文明史、汉藏关系及吐蕃统治时期各个方面的主要参考文献。

法国汉学界是海外敦煌学的一个重镇,既有伯希和所获的丰富藏品,又有雄厚的研究传统,从沙畹以来的汉学大师,如伯希和、马伯乐、戴密微、谢和耐,以及藏学、中亚学的顶尖人物,都对敦煌学有或多或少的贡献。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科研中心敦煌学研究组的成员,发挥集体的优势,陆续编辑出版了《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和5本敦煌学论文集。1998年,以利用敦煌材料研究“书籍考古学”著称的戴仁(J.-P.Drege)教授就任法国远东学院(EFEO)院长后,更加大力推动法国敦煌学的发展。他一方面邀请有成就的美国、日本、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者到巴黎讲学,一方面编辑出版敦煌学专题研究文集。

法国拉露小姐(1890—1967),曾研究过藏文佛经及《甘珠尔目录》等,后任巴黎大学教授。其藏学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古典藏语初阶》《论佛教巫术》《论藏文再后加字》《吐蕃文书中的罗摩衍那故事》《敦煌文书》《高地亚洲宗教信仰中通向幽冥之路》《在敦煌发现的最古老的吐蕃文书》《吐蕃王室殡葬中的苯教仪轨》《八世纪吐蕃官员请求复职表》《古代吐蕃疆域表》《七至九世纪的汉藏关系》等。她终生未婚,以毕生大部分精力对伯希和运到法国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写卷进行整理编目。共编成三大册,第一册(1—849号)(是选编而不是连续编号,以下2册同),1939年出版;第二册(850—1282号),1950年出版;第三册(1283—2216号),1961年出版。这部目录为各国学者研究敦煌藏文写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汉学大师戴密微《吐蕃僧诤记》<sup>[2]</sup>根据P.4646号王锡撰《顿悟大乘正理决》为主要材料,参考了敦煌藏文文献,还原了792—794年汉地僧人和西藏僧人关于禅宗理论的一场论战,最后失败一方退出藏地的重要史实。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对西藏历史的研究迅速发展。如上所述。70年代中期山口瑞凤组织聘请藏人参加编目工作,从1977到1988年,在东洋文库编出《斯坦因搜集的藏语文献解题目录》达2500多号。1926年,中亚史专家羽田亨和伯希和合作出版了《慧超往五天竺传》和《如来像法灭尽记》。前者是盛唐时期对中亚、印度、西藏的目击记录,后者使人了解了其中的一部分与《丹珠尔》的《和阗史》相符。佐藤长根据编年史首先澄清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王那段时期独特的汉藏关系,而后利用达扎路恭碑考证了763年吐蕃进犯唐都长安的情况。并且依据藏汉文献确认了松赞干布首席大臣噶·东赞及其家族成员的

活动情况;导致建中年间与唐朝和盟的各种事件;长庆年间唐蕃和盟情况等。

山口瑞凤撰写了两篇关于达玛的论文,认定达玛是他的首席大臣杰托莱达那所杀:他对唐蕃会盟碑“舅甥”的含义、松赞干布之子贡松贡赞在位期、文成公主入藏及其婚姻和松赞干布的时代进行了研究。他的巨著《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sup>[3]</sup>分3个部分,阐述了与吐蕃前期历史有关的各种问题;雅砻王朝到吐蕃王朝的发展过程;吐蕃王朝的外交关系及国家机构,特别是第三部分,涉及诸如立法制度及军事组织的内容,表明对吐蕃早期的研究达到相当的深度。山口瑞凤对藏学研究无可比拟的贡献之一是他对藏文历史文献中年代计算方法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大量的有关佛教、藏文字母表及藏文文法的研究。近年,日本上山大峻根据敦煌汉文藏文写本撰写了经典著作《大蕃国大德法师沙门法成研究》<sup>[4]</sup>;此后,法国吴其昱又写了《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传考》<sup>[5]</sup>,考订了戴密微《吐蕃僧诤记》的错误,重构了吐蕃时期敦煌汉藏文化和佛教传译交流的重大课题,重现了从陈寅恪开始研究的道真、昙旷、法成对于吐蕃时期敦煌佛教的关键作用。这些都是利用了敦煌汉文、藏文写卷的重大研究成果。

### 3 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史料价值

#### 3.1 敦煌古藏文文献资料传世的独特性

所谓敦煌古藏文文献,是指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藏文文献。按照学术界对藏经洞封闭下限的共识,是在11世纪初,其例证最晚为文献题记中的“咸平五年”<sup>[6]</sup>推算从吐蕃占领敦煌,到吐蕃退出敦煌以后的一段延续时间,则应为8—10世纪之间。敦煌藏经洞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使得这些吐蕃时期的文献成为唯一的大规模的藏品。

#### 3.2 敦煌古藏文文献重构了西藏“前弘期”史实

吐蕃在公元848年发生了“朗达玛灭佛”的重大事件,从此西藏陷入百年动乱之中,吐蕃帝国不复存在,而分裂为诸多互相征伐的诸侯小邦;吐蕃皇室和寺院的经教文献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直到百年之后,诸多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伏藏”重新出土,才依靠宁玛、萨迦等教派的努力,尤其是元代八思巴以后,才重新振兴了佛教。由于缺少前弘期的资料,即使是西藏最著名的经典作家,对于吐蕃和前期的历史,也是充满了猜测和神话的成分。

#### 3.3 敦煌古藏文文献填充了吐蕃占领期间敦煌的历史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以及其后,虽然藏文、汉文、回鹘文并行,但是研究者着重在汉文资料方面,而对于更多数量的藏文资料则研究不足。官方文书以藏文为主,现在已经逐步披露一些重要的材料,对于吐蕃占领期间的政治事件、行政管理等都有重大的突破。

#### 3.4 敦煌古藏文文献纠正了汉文资料的错误

汉文资料中表现的某些偏见,在藏文资料中还还原了历史真相。譬如汉籍关于藏汉僧诤的记载,是以汉僧摩诃衍获胜为终局,而吐蕃文献记载是印度僧莲花戒获胜。此后在藏地通行的是印度渐悟教派而不是汉地禅宗顿悟教派,即是明证藏文文献的记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 3.5 敦煌古藏文文献记载了早期藏族文化的独特作用

关于西藏早期文化,汉文文献主要在官方正史中有所记载,并不直接;而敦煌汉文文献记载也大多是间接地加

以引正。藏文文献中有大量西藏苯教或者萨满教的写卷,有民族、民俗日常生活的文书,尤其有大量当时流行而后弘期已经湮没的密教典籍。这些都是汉文文献中少见或者没有的。

### 3. 6 敦煌古藏文文献体现了民族文化交流

由于藏汉交流的需要,藏文从汉籍中翻译了许多儒家典籍,尤其是编纂了一些藏汉对照的词典,比如《翻译名义集》等,在一些重要经卷、赞颂或者童蒙识字课本中都标注了藏文音译。这对于今天的语言文字学家了解、破解古藏文具有重要的意义。

### 3. 7 敦煌古藏文文献丰富了书志学的形式

吐蕃文字书写阅读方向和汉籍不同,吐蕃造纸的形制和汉籍不同,因此,吐蕃的图书装帧形式也表现为更胜于汉籍的多样性。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藏汉对照词典,采用的是类似于旋风装的形式,许多梵夹装的经典用细绳缝纫串联,粘叶装也很早出现在藏文写本中,等等。很难说,多样化的装帧形式中是谁先谁后。但是,书志学的一些问题难以破解,不妨从多民族文化影响的角度去进行考察。

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史料价值是多元的、丰富的,随着我们对这些文献研究的深入,其价值会以日益灿烂的面貌发掘出来。对此,可以说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

### 4 敦煌古藏文文献整理出版的意义

我国藏学研究的先驱者道泉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负笈巴黎就学时就注意到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且受当时北平图书馆的委托,谋求对这些文献进行复制、摄影,以期携归国内供国人研究。但由于受到收藏单位的掣肘,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以至国内学人长期无缘从事研究,只能望洋兴叹。1961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建议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把英国国家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所藏敦煌藏文写本胶片也收购进来,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陈先生的建议未能实行。

我国学者对敦煌藏文文献的价值虽早有认识,对其研究也酝酿已久,但成果的发表却迟至1978年,开风气之先的当为黄文焕先生发表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sup>[7]</sup>一文。该文通过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以及兰州等地所藏吐蕃文书的调查与整理,指出现存河西的吐蕃文书达9000多页,并论述了这些文书多方面的宝贵价值。近年,由王尧主编,陈践、褚俊杰、王维强、熊文彬参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sup>[8]</sup>也得以问世,公布了全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目录,计有编号4450个,含3375个卷号,这是古代藏族文献研究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除藏文外,敦煌还出土有一大批与吐蕃密切相关的汉文文献,它们与藏文文献一样,对于吐蕃史和汉-吐蕃关系史来说,无论就历史、地理,还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或宗教、民族学,都是第一等重要的资料。于道泉、王重民、向达诸先生都曾对此花过心力,在海外访问、研究期间,孜孜不倦搜集、抄录,做过报导,可惜形成文字、公诸于世的文献却为数不多。对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其实也是最近20年间发展起来的。

英藏、法藏材料长期以来一直是5—10世纪中原和吐蕃历史的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可惜国内目前仅仅有王尧等编纂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录,而对于英国所藏文献则连

完整的目录也没有,学者们一般无缘对具体文献进行直接研究。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等单位购买了法国的缩微胶卷,但是当时制作时就已缺失很多,其他单位更难看到。即使国外的研究也因主要依靠缩微胶卷,尚没有完整的纸质出版物行世,而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西方着重于文字学、语义学的传统来说,民族古文字资料研究一直是热点。

将全部英藏、法藏藏文文献研究、整理、出版,更是我国几代藏学专家梦寐以求的大型文化工程。从2004年开始,西北民族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联络英国、法国国家图书馆,准备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民族古文献。在2005年初得到两国图书馆的响应,并且在国际敦煌项目IDP第六次会议(北京)期间,两国图书馆负责人就此进行了商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分别签署了合作编纂出版的意向书即实施细则。通过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合作,我们可以首次最大可能地利用敦煌古藏文资料,对西藏早期文字形成和文化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同时,考证、比定、公布大量流失海外的古藏文文献,必将引起国际藏学界、敦煌学界、汉学界的密切关注。

藏民族具有丰厚优秀的文字、文化传统,在唐代创制文字之后,吐蕃王朝留下了无数的写本文献和大藏经,是我国文化建树最多、成就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对于藏族吐蕃时期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的研究,可以充分论证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同时也充分证明西藏和内地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学习,是藏汉民族关系的主旋律。

### [参考文献]

- [1] LdelaVallee Poussin.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2] (法) 戴密微. 吐蕃僧诤记 [M]. 耿昇译.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 [3] (日) 山口瑞凤. 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 [M]. 东京: 岩波书店, 1983.
- [4] (日) 上山大峻. 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的研究 [J]. (京都) 东京学报, 1967 (39): 119- 222.
- [5] (法) 吴其昱. 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成传考 [C] // 讲座敦煌 7 敦煌与中国佛教. 东京: 大东出版社, 1984: 383- 414.
- [6]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俄罗斯东方文学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藏敦煌文献 (Dx32a-b)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7] 黄文焕. 河西吐蕃文书简述 [J]. 文物, 1978 (12).
- [8] 王尧, 等.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 [K].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9.

[作者简介] 束锡红 (1964-), 女, 江苏无锡市人, 北方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民族学、文献学。

[收稿日期] 2007- 03- 11 [责任编辑] 肖群